

宋大川 主编

北京考古史

金代卷

丁利娜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宋大川 主编

北京考古史

金代卷

丁利娜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序

记忆的历史,有着不同的“版本”,比如神话传说,比如民俗,比如历史文献,比如考古学遗存,等等。它们都记忆着历史,它们是历史记忆的不同“版本”。宋大川先生主编的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不仅是北京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发现与研究考古学遗存所认识的北京史。例如其中《史前卷》中的《附表》,即《北京史前考古大事年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史的历程,这就是北京的考古学史。因此,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考古学遗存所认识,或所表述的北京史,和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史的历程,即北京的考古学史,便是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所涵盖的内容。这也是此书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这两史各自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就一个人来说,也因时、因视角、因视点而异。我在此时此刻所要说的则是:

从北京的考古学史来看,我认为之所以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一靠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二靠考古学的实践,三靠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没有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不会有考古学。没有考古学,哪来的考古学实践?没有考古学实践,哪来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所以考古学要存在,要发展,就得做好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

同时,应指出的是,考古学史既有横向延展的历史,又有纵向发展的历史。移用现有的或他人、异地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进行遗存的研究,即使有新发现,产生了历史的新认识,也只能称之为考古学的发现史。如果考古学仅停滞于这一层面,那么,它展现的历史,便只能算是考古学发现史,即考古学史中横向延展的历史。只有推进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考古学才能既出现横向的延展,又呈现纵向的发展。既有横向延展、又呈纵向发展的考古学史,才是全面的考古学发展史。这样的考古学发展史,应是中国考古学人的追求。当然,我希望北京的考古学人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更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的实践,虽是推进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更新的前提,但要实现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创新,则需勤于在考古学实践中增加一个“悟”字,这也是我对北京考古人的一点希望。

至于文物保护与考古学发展应当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个人历来主张应该是良性互动和推进考古学的持续发展。我们应知,只有持续的文物,才能有持续的考古学发展。因此,这两个持续当是我们的追求。从这十卷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认识的北京史

来看,一是我看到了北京考古学的成就,二是从当前文化建设来考虑,北京史本身确实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两三卷,也不是四五卷,而是长达十卷本的北京史。这篇幅巨大的北京史,体现了北京考古学成就的巨大。

这体现了北京考古学人巨大成就的北京史,引起了我们哪些思考?

一是要理解北京史,就得明白北京所处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环境。北京处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地当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交界处,是面向欧亚大陆的中国西半部和面向海洋的中国东半部的连接地带。这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两类地理环境的位置。

二是北京是猿人演进为现代人的地区,很可能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转化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地区。关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问题,暂无人涉及。因此,暂难言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问题。打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北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族群文化的文化品性,存在如下应注意的文化现象:

其一,从新石器时代起,可以认为北京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或任何一种族群文化,就其文化构成来看,都是以一元为主的多元谱系的文化结构,即杂种文化。这种杂种文化乃是不同谱系的文化杂交产生的。所以出现文化杂交,乃是文化碰撞与交流的结果。

其二,北京是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族群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和争夺的地带。有时,北京存在多种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的文化割据并存的局势。有时,北京局部地区出现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文化的更替。有时,整个北京地区出现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的更迭。同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族群文化延续时间之短,和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同一族群文化更迭频率之快,乃是北京文化演进的一个特点。

其三,西周封燕,是北京历史上出现的大事。所以是小事,一是开始将北京纳入中国的政治版图,二是出现了政权和文化的新关系。西周早期,周王朝(或燕国)政治版图或政权统治所及,仅限于北京部分地区。在这部分地区内,文化则是多元的。到西周中期,燕国政治统治涵盖了整个北京。此种现象,相对于此前的文化“一本多元”来说,我们称之为“一统多元”,即政权一统,文化多元。直到春秋晚期,才出现了政权与文化的“一统一元”,即政权统一,文化一元。自此以后,这种“一统一元”和“一统多元”的更替,一直延续到现代,这是北京政治与文化的一个特点。同时,需指出的是,“一统多元”下不同文化或族群的居民,既存在聚居,又存在杂居的现象,就聚居和杂居关系而言,又存在大聚居、小杂居,大杂居、小聚居和聚居、杂居难分秋色等不同情形。这是北京“一统多元”政治与文化的另一个特点。这两个特点,是我们论北京史者必须纳入眼帘的。

三是北京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步伐,大致同全国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步伐一致,即经历了中国的北京、亚洲的北京和世界的北京三大时期。所谓世界的北京,说的是北京自明代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这使北京成为了世界的北京。除少数年代外,因为北京是这个时期中国的首都,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故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时的北京处于漩涡中心,走过的道路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迂回曲折。现在该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

了,该冷静下来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了。什么是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我以往讲的“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八个字。所谓“传承”,是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所谓“吸收”,是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所谓“融合”,是将这两种优秀文化融合起来,如“中体西用”、“中西之间”和“西体中用”等等;所谓“创新”,就是在“融合”的基础之上,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创造出新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乃是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这是被恩格斯所肯定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指出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在史前社会中就已存在,并呼唤在“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以“更高级形式”复活这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其实对中国来说,这种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也不是什么舶来品,这种文化已经以初级的形式存在于我国古代的氏族制度中,不过在我国由氏族制度社会发展为文明社会的过程中逐渐被民本思想和更恶劣的专制文化代替了,除保留一点痕迹外,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尘封在历史的博物馆中。是恢复我们记忆的时候了!是从西方的文化中学习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的时候了!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来到中国大地时,中国文化的特色不会消失,而将如苏秉琦所说的那样,仍是世界文化中的一个相对独立区系,和世界文化的关系则如费孝通所讲,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此时中国文化方显出勃勃生机。

是以为序。

张忠培

12-4-22 成书于小石枰

前 言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延续未曾间断的历史名城,有着数十万年的人类居住历史,3 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50年的建都史。漫长的发展岁月中这里积淀了极为广博深远的文化遗存,它们是北京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代表性文物遗迹,是数千年来北京从最初的原始聚落发展到今天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物证,而这些历史的印迹只有一部分见于文献典籍,绝大部分则尘封于地下,需要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去再现。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地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业绩卓然,展示了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构建和诠释北京地区社会发展历史与城市变迁历史方面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

如果从1927年周口店遗址的发掘算起,北京地区的史前考古已经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基本建立了北京地区史前考古的文化序列。周口店遗址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及猿人使用的石器和用火遗址,证实50万年以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其创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区的史前考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继续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外,还新发现了一批史前文化遗存,获得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对推进北京地区早期人类及其文化演进历程的探讨具有重要作用。据统计,北京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石器出土地点约48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墓葬和零散遗存点约4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在北京城区和多个郊区,共同构建了北京地区史前历史发展的脉络,为认识北京地区史前文化结构和研究不同史前文化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北京地区的历史时期考古内容丰富,在反映北京文化内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北京地区三代考古的重大贡献是为西周初年封立“燕”、“蓟”二国及“燕”、“蓟”古城的探讨提供了实物资料。琉璃河遗址发现的燕都古城以及大量西周时期墓葬、车马坑和带有燕侯铭文的众多青铜礼器,印证了文献所载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和封召公于燕是信史,同时也弥补了文献记载的匮乏及不确定性,笼罩在北京古都城市历史起源上的迷雾正在廓清,“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愿望正在实现。而“玉皇庙文化”的发现则表明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北京地区始终存在着南北两个不同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即位于北京南部的燕文化和位于北部燕山山地间的“玉皇庙文化”。“玉皇庙文化”的发现独立地回答了文献资料所无法回答的历史问题,进一步展现了通

过考古学构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历史的可能。

北京地区秦汉及其以后各个历史时期也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对北京史的认识。北京地区秦汉古城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为研究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度和北京地区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增加了资料。北京地区城市考古调查与研究的开展,基本究明了北京名城各时代的历史发展系列。古蓟城、西晋蓟城、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等城市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为研究北京城市的发展演变和城市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大量极为重要的、科学的史料,考古调查与研究获的有关城池、建筑、街巷道路、宫殿苑囿、手工业生产作坊、城市的河湖水系等的各种实物资料丰富了北京史研究的内容。

金代皇陵、明定陵、清代园寝等帝王陵墓考古所取得的诸多重要成果,使人们对陵园分布、陵园布局、陵寝建筑、陵邑形制等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对于研究陵寝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也为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汉代以降各个历史时期的一般墓葬的发掘,数量更是惊人。大量墓葬的清理及相关的墓葬考古研究,丰富了相关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资料,促进了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历史研究,起到了考古补史、证史的作用。

北京地区的历史时期考古以实物资料串联起了北京历史发展的链条,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北京城市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水平,不断地为我们对北京古代社会不同阶段城市发展的认识增加新的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北京社会发展史的历史文化内涵。

北京考古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与反思是北京考古工作者的职责与义务,及时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北京考古工作的发展过程,同时也能在回顾与前瞻、反思与总结中不断明确北京考古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织编写了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希冀对北京考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为促进北京考古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本书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集体研究成果,并拥有全部著作权。宋大川作为主编,做了策划、组织和审稿工作;夏连保作为副主编,协调了本书的编写事务;史前卷由郭京宁著,夏商周卷由张智勇著,东周卷由王继红著,汉代卷由胡传耸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由董坤玉著,辽代卷由于璞著,金代卷由丁利娜著,元代卷由孙勳著,明代卷由李永强著,清代卷(上)由朱志刚著、清代卷(下)由张中华著。

本书史前卷由吴加安先生审稿,夏商周卷由赵福生先生审稿,东周卷由靳枫毅先生审稿,汉代卷由信立祥先生审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由乔梁先生审稿,辽代卷由齐心先生审稿,金代卷由陈平先生审稿,元代卷由魏坚先生审稿,明代卷由荣大为先生审稿,清代卷由李建平先生审稿。

特别要感谢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先生奖掖后学,欣然为本书作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先生大义,吾侪铭刻于心。

诚然,《北京考古史》的编写只是个初步的尝试,不足之处很多,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讨论,我们真诚地希望抛出这块粗砖,引来众多有识之士的美玉,从而快速推进北京考古研究的发展。

宋大川

二零一二年五月

绪 言

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历时120年。在此期间,北部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对金朝本土,而且对同时期的南宋以及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帝完颜亮正式迁都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开启了北京作为我国政治中心的历史序幕,确立了北京在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人称“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多且久莫如关中,今则燕京而已”^[1],而这一转变正是从金朝开始的。金中都作为金朝国都,为北京建都之始,也开辟了北京城市发展的新纪元。北京作为国都,一直为元、明、清所沿袭,乃至今天,已有850多年的历史。

20世纪以来,学者对金史以及金代社会的研究日益丰富,尤其是20世纪后二三十年,随着“华夷正闰观”、“贵中华、贱夷狄”、“征服王朝论”等陈腐观念的彻底摒弃,“中华一体”论、“中华一统”论等理念的深入,金史的研究随之空前活跃起来。同时,金史研究与民族史、历史地理、区域文化、文学、习俗、考古等研究相结合,涉及到金代社会研究的方方面面^[2]。金朝的历史地位也日益被学者提上高度,新近出版的《女真帝国传奇》^[3]、《女真传奇》^[4]、《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大金国的建立》^[5]等更是将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的历史地位推向了高潮,将其视作历史的一个奇迹。

女真族这一名称从严格意义上说,应当是一个部落联盟的名称,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同种的民族。女真族的主源是黑水靺鞨,与先秦时的肃慎、汉至晋的挹娄、南北朝的勿吉、隋至唐初的靺鞨有着渊源关系。据史料记载,最初的女真人,只是原黑水靺鞨十六部中除了粟末、伯咄、安车骨、白山等四部外的十二部民。同时,女真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不断吸收或同化着其他族人。如《辽史》中记载,辽天显三年(928年)被迫南迁的部分渤海人,“其民或亡入新罗、女直”。在阿骨打取得出河店战役胜利后,原在辽朝统治下的“铁骊、兀惹皆叛入女直”。另外被同化的还有部分契丹人等。正如《剑桥中国辽金元史》中所说那样,“契丹、女真、党项这些称呼,

[1] 姜宸英:《日下旧闻考·序》,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六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2] 张博泉:《近百年来金史研究的进展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4期。

[3] 孙昊、杨军:《女真帝国传奇》,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

[4] 祝勇:《女真传奇》,《鸭绿江》2008年5期。

[5] 裘真:《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大金国的建立》,《学理论》2008年5期。

实际上是指在契丹人、女真人或党项人领导下的那些联盟。这些名称从语言学上说,就是这些联盟内部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团的名称。这些联盟本身都是多种族和多语言的,……女真人同样是这种情况”。

女真一词在女真文中写作“𡗗岑”,读如“诸申”,其读音与史料中对这一族属的不同名称的读音非常接近,如肃慎、靺鞨、虑真、朱理真、朱里直、诸申、女直、女质、朱里扯特、主儿扯惕、拙儿擦歹等,这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代对“𡗗岑”女真语言的音转^[1]。民国时孟森在《清朝前纪》中也指出:“女真起于辽世,或谓即古肃慎之转音,当可信。”而“女真”作为一个族的名字比较可信的还是可能出现在五代时期。

(辽代)阿保机虑女真为患,乃诱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不得相通。入辽阳著籍者名曰“合苏款”,所谓“熟女真”者是也。自咸州之东北分界入山谷,至于束沫江,中间所居,隶属咸州兵马司,许与本国往来,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束沫江之北,宁江之东北,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余万,散居山谷间,依旧界外野处,自推雄豪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则谓之“生女真”^[2]。

即辽代的女真有熟女真和生女真之分,熟女真分布在今辽阳之南,生女真分布在今松花江以北、以东的地区。生女真完颜部是后来建立金王朝的主体,其始祖函普大约生活在公元10世纪,大致与契丹阿保机建国处在同一时期。从函普到阿骨打建立金朝,大约历经了两个世纪。期间,女真长期处在辽朝的统治之下,不仅在政治上受契丹统治者的压迫,而且在经济上受其掠夺和剥削。

辽天庆二年(1112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不堪忍受契丹的统治,率部抗辽。次年(1115年)正月,即皇帝位,国号大金,改元收国,是为金太祖。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位虽仅九年,但其奠定了金源一代的统治基础。其继承者金太宗完颜晟在位期间,灭辽克宋,“经国规摹,至是始定”^[3],巩固了金朝的统治秩序。金熙宗完颜亶、海陵王完颜亮两朝是金代的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各项制度逐步建立和日臻完善。中央集权加强,社会经济发展,中原文化在金国得到传播。海陵王完颜亮在位期间,将金朝统治中心从上京迁往中都,接着发动了不合时宜的对南宋的战争,使得当时的社会遭到了严重破坏,海陵王自己身丧战争之中。金世宗完颜雍、章宗完颜璟在位期间,金朝社会发展到了鼎盛阶段,所谓“治平日久,宇内小康”^[4]。然而章宗后期金朝社会的内外矛盾加剧,由盛而衰。及至其继位者卫绍王完颜永济时,“政乱于内,兵败于外”^[5],加速了金朝的衰落。宣宗完颜珣即位后,在蒙古军的进攻之下,金朝于贞祐

[1] 宋大川、夏连保、黄秀纯主编:《金代陵寝宗庙制度史料·前言》,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2]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附录一《女真传》,中华书局,1986年。

[3] (元)脱脱:《金史》卷三《太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

[4] (元)脱脱:《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中华书局,1975年。

[5] (元)脱脱:《金史》卷十三《卫绍王纪》,中华书局,1975年。

二年(1214年)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河北各地尽为蒙古所有,南宋又罢纳岁币,于是,金朝用兵于南宋。南宋则与西夏联合起来,进攻金朝。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后,虽然全力以赴抵抗蒙古,但是已无力回天,天兴二年(1233年),蒙古军攻陷汴京,哀宗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三年(1234年)正月,金朝在蒙古与南宋的联合进攻下灭亡。

在一百二十年的金朝历史中,有过两次正式迁都。第一次是在金帝完颜亮时期,贞元元年(1153年)从金初都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市南白城)南迁至燕京,升为中都(今北京)。第二次是在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从金中都南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作为大金帝国六十余年的都城至此失陷。从此二十年后,金朝覆灭。金朝历史上两次迁都的三个都城中,金上京作为金朝崛起、建立和发展阶段的都城,历时不满四十年;金中都作为金朝鼎盛阶段的国都历时六十余年,而汴京作为金朝都城时是其走向衰亡的二十年。从中足见金中都在金朝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价值。

金帝完颜亮迁都燕京后,采取了一系列的皇权巩固措施。贞元三年(1155年)三月,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帝如大房山,营山陵。正隆元年(1156年)十月,葬始祖以下十帝(指金朝建立之前的始祖函普、德帝乌鲁、安帝跋海、献祖绥可、昭祖石鲁、景祖乌古乃、世祖劬里钵、肃宗颇喇淑、穆宗盈歌、康宗乌雅束)于大房山^[1]。正隆二年(1157年)十月,(完颜亮)“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2]，“尽徙宗室于南”，且下令“征调四方之民以实京师”^[3]。至此金王朝的统治中心已完全从上京转移到中都,中都地区一时成为北方各族人民汇聚之地。

伴随着这次迁都燕京,金朝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金帝完颜亮以篡杀登位,对宗室贵族颇多疑忌,及至迁都燕京后,“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4],以便于加强对他们的控制。《金史·兵志》对这次移民的迁入地有较为具体的记载:

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幹、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勛、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翰论、和尚、胡刺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果国公郭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

可见,这次南迁至金中都的多为女真贵族。关于此次移民的时间,《兵志》的记载比较含糊,似乎移民是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燕京同时进行的,而据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考证,此次移民实际上应是海陵王正隆元年的事情^[5]。1980年出土的《乌古论窝论墓志铭》证明三上氏的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该墓志云:“正隆之初,起十三贵族猛安以控制山东,公家遂居莱州。”^[6]在这次

[1] (元)脱脱:《金史》卷五《海陵纪》,中华书局,1975年。

[2] (元)脱脱:《金史》卷五《海陵纪》,中华书局,1975年。

[3] (清)嵇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帝系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 (元)脱脱:《金史》卷八《世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

[5] [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金启孙译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78~179页。

[6]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1983年。

女真贵族南迁之前,金初太宗和熙宗朝曾先后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迁徙浪潮。第一次是在太宗天会十一年(1133年),

是秋,金左副元帅宗维(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1]。

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2]。

第二次是在熙宗皇统初年,

金人既复取河南地,犹虑中原士民怀二王之意,始创屯田军,及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馱。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3]。

从金太宗到完颜亮的三次大规模移民活动,使得猛安谋克的人口分布区域从金初的上京、东京、咸平府三路扩展到以下十二路:上京、东京、咸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此后猛安谋克人口的这种地理分布状况基本趋于稳定。

金朝统治者在金中都六十二年的精心经营,创造了金朝灿烂的历史文化,也为北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大量金代遗迹、遗物的发现,为我们揭开了北京这座古代都城的厚重历史。北京地区的金代考古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开展较少。新中国诞生六十年来,北京地区的考古事业蓬勃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金代考古工作中,除了对金中都的城垣、内城、宫殿等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外,还发现了金代皇陵以及大量的金代贵族墓葬群和较多的平民墓葬。此外,还有较为重要的窑址以及窖藏、塔基遗迹等。日渐丰富的考古成果,使得北京地区的金代历史文化和考古研究能够向着更深的层次推进,涉及到北京城市发展史研究的诸多方面。

[1]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56年。

[2]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八《太宗文烈皇帝纪》,中华书局,1986年。

[3]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十八,中华书局,1956年。

目 录

序	张忠培	(1)
前 言	宋大川	(1)
绪 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北京金代考古发现概述		(1)
第二节 北京金代考古研究综述		(7)
第二章 金中都		(10)
第一节 从金上京到金中都		(10)
第二节 金中都遗址		(20)
第三节 金中都与金上京的比较		(50)
第四节 从金中都到汴京城		(54)
第三章 金皇陵		(56)
第一节 从金上京皇陵到中都金陵		(56)
第二节 房山金陵遗址概述		(62)
第三节 房山金陵陵墓		(65)
第四节 房山金陵其他遗迹		(89)
第五节 金陵遗址的几个特点		(97)

第四章 金代墓葬 ·····	(100)
第一节 金源上京地区金代墓葬特征简述·····	(102)
第二节 北京地区金代墓葬的形制分类·····	(105)
第三节 北京地区几处重要的金代墓葬·····	(121)
第四节 北京地区金代墓葬小结·····	(141)
第五章 金代宗教遗迹 ·····	(144)
第一节 金代的宗教·····	(144)
第二节 北京地区金代宗教遗迹·····	(147)
第六章 金代窖藏遗迹 ·····	(161)
第一节 钱币窖藏及金代的钱币制度·····	(161)
第二节 铁器窖藏及金代冶铁业·····	(164)
第三节 生活用具窖藏·····	(165)
第七章 金代其他考古遗迹 ·····	(167)
第一节 金代瓷窑址·····	(167)
第二节 金代摩崖石刻·····	(168)
第八章 结 语 ·····	(170)

插图目录

图一 金上京示意图·····	(14)
图二 辽上京示意图·····	(14)
图三 金中都示意图·····	(21)
图四 汴京城示意图·····	(22)
图五 吕微墓表·····	(26)
图六 凤凰嘴西南角金中都城墙遗址·····	(27)
图七 万泉寺金中都南城墙遗址·····	(28)
图八 高楼村金中都西城墙遗址·····	(28)
图九 金中都城坊复原示意图·····	(32)
图一〇 金中都皇城、宫城复原示意图·····	(35)
图一一 金中都大安殿遗址·····	(41)
图一二 宫殿区遗址出土铜坐龙·····	(41)
图一三 宫殿区遗址出土摩羯带柄铜镜·····	(41)
图一四 水关遗址位置图·····	(43)
图一五 水关遗址发掘现场·····	(43)
图一六 水关遗址地层堆积·····	(44)
图一七 水关遗址全景·····	(44)
图一八 水关遗址辟石柱·····	(44)
图一九 水关遗址木银锭榫·····	(45)
图二〇 《营造法式》注释石作制度图样·····	(45)
图二一 西营遗址发掘区位置图·····	(46)

图二二	西营遗址发掘区一角俯视图·····	(47)
图二三	西营遗址发掘区房屋基址·····	(47)
图二四	西营遗址J1出土盃甲残片·····	(49)
图二五	金中都皇陵陵域图·····	(61)
图二六	金陵位置图·····	(63)
图二七	金陵地势图·····	(64)
图二八	金陵主陵区·····	(64)
图二九	金陵遗迹分布图·····	(64)
图三〇	金陵M6地宫全貌·····	(67)
图三一	金陵M6-3雕刻凤纹石椁东壁拓片·····	(68)
图三二	金陵M6-3木棺·····	(68)
图三三	金陵M6出土金丝凤冠·····	(68)
图三四	金陵M6白玉凤佩饰(1)·····	(69)
图三五	金陵M6白玉凤佩饰(2)·····	(69)
图三六	金陵M6玉雕凤鸟纹饰件·····	(69)
图三七	金陵M6-4雕龙纹石椁盖及四壁展开图·····	(69)
图三八	金陵M6-4团龙纹石椁拓片·····	(69)
图三九	金陵M7出土残石碑拓片·····	(71)
图四〇	金睿宗墓碑·····	(74)
图四一	金陵M9墓道平、剖面图·····	(75)
图四二	金陵M9墓门上石斗拱·····	(76)
图四三	金陵M9墓门两侧云龙纹石抱柱·····	(76)
图四四	金陵M9墓门底部方木条封门·····	(76)
图四五	石门峪石垒陵墙·····	(81)
图四六	石门峪残损的石坐龙·····	(81)
图四七	长沟峪五石椁墓平面位置图·····	(82)
图四八	长沟峪五石椁墓银饰红漆棺·····	(82)
图四九	长沟峪五石椁墓出土透雕折枝花玉锁·····	(83)
图五〇	长沟峪五石椁墓出土透雕折枝花玉饰·····	(83)
图五一	长沟峪五石椁墓出土透雕双鹤卷草纹玉饰·····	(83)
图五二	金陵2001FJLM2平、剖面图·····	(89)
图五三	金陵2001FJLM4平、剖面图·····	(89)
图五四	金陵2001FJLM4出土铜首铁剑·····	(89)
图五五	金陵2001FJLM4出土青玉石枕·····	(89)
图五六	金陵2001FJLM5出土龙凤纹罐·····	(89)

图五七	金陵石桥平、剖面图	(90)
图五八	金陵石踏道平、剖面图	(90)
图五九	金陵石栏板双龙图	(91)
图六〇	金陵1号台址平、剖面图	(91)
图六一	金陵2号台址平、剖面图	(91)
图六二	金陵F2西大殿平、剖面图	(92)
图六三	金陵F4平、剖面图	(92)
图六四	金陵F5建筑遗址全景(南—北)	(93)
图六五	金陵M6西侧陵墙	(93)
图六六	金陵小宝顶以西陵墙拐角	(93)
图六七	金陵东排水沟出口	(94)
图六八	金陵P3与P4交汇处	(94)
图六九	金陵清代小宝顶及前享殿碑亭位置图	(95)
图七〇	金陵清代修筑的小宝顶	(95)
图七一	金陵出土绞尾铜坐龙	(96)
图七二	金陵出土方格乳丁纹双耳簋	(96)
图七三	金陵出土铜人像	(96)
图七四	金陵出土白釉碗	(96)
图七五	金陵出土褐釉盏	(96)
图七六	金陵出土石坐龙	(96)
图七七	金陵出土琉璃鸱吻	(97)
图七八	金陵出土灰陶迦陵频伽	(97)
图七九	金陵出土三彩瓷枕	(97)
图八〇	金陵出土鎏金银面具	(97)
图八一	大兴小营金墓平、剖面图	(107)
图八二	天坛公园金墓平、剖面图	(107)
图八三	大兴北程庄M32全景	(108)
图八四	大兴北程庄M32墓室	(108)
图八五	大兴北程庄M6板椁窗	(108)
图八六	大兴北程庄M12墓门	(108)
图八七	延庆张山营金墓平、剖面图	(109)
图八八	延庆张山营金墓砖雕彩绘斗拱	(110)
图八九	大兴北程庄M33墓顶及墓室	(110)
图九〇	大兴北程庄M33出土器物(1)	(111)
图九一	大兴北程庄M33出土器物(2)	(111)